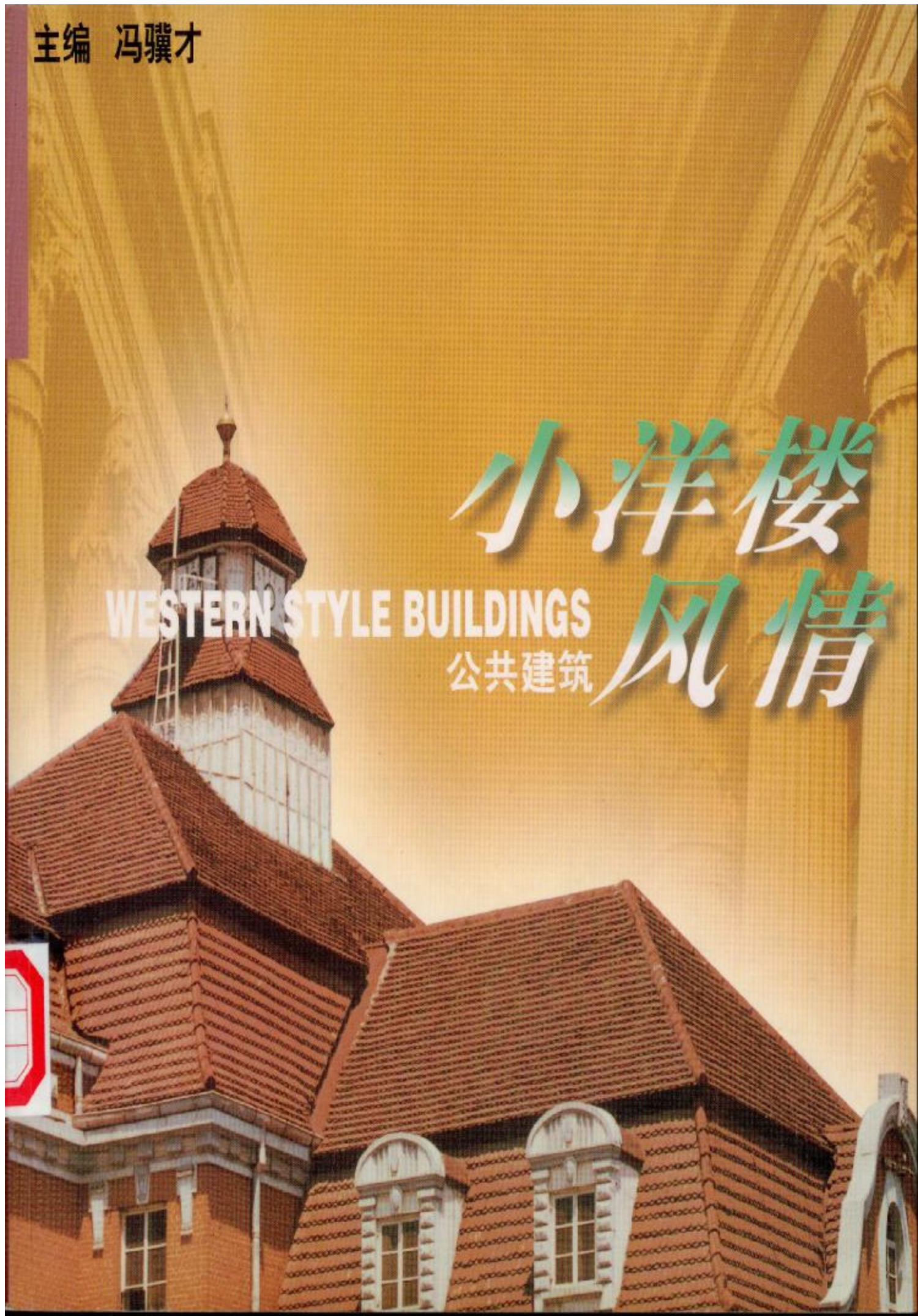


主编 冯骥才

WESTERN STYLE BUILDINGS
公共建筑

小洋楼 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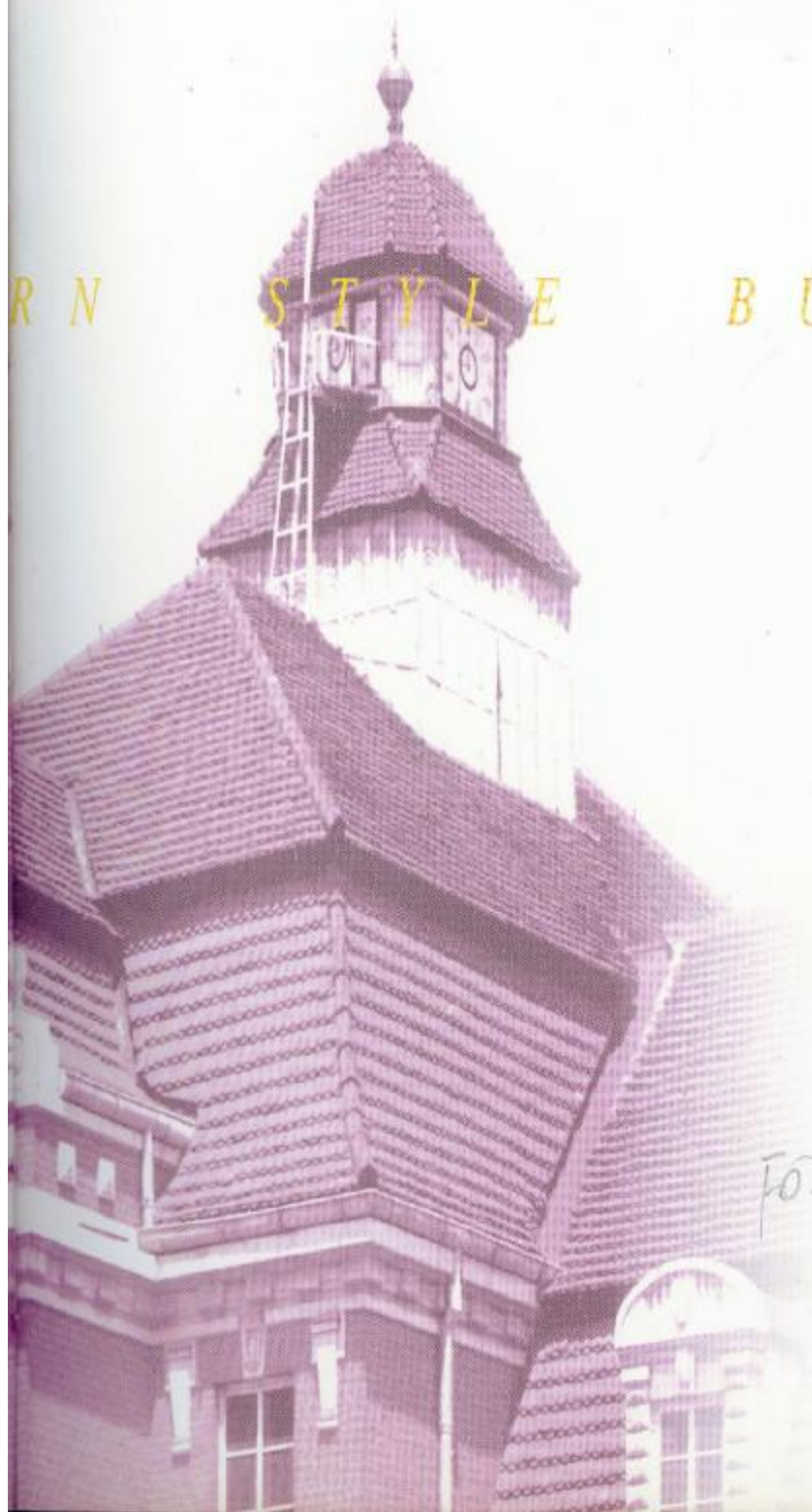
大树夏绿
文化研究丛书

主编 冯骥才

公共建筑

ERN STYLE BUILDINGS

小洋楼风情



2016/16



主编 冯骥才

小洋楼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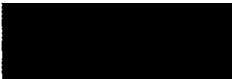
公共建筑

责任编辑 鹿芙蓉
装帧设计 陈幼林视觉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3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199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2开(787×1092毫米)
插 页 5
印 张 18印张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5309-2327-5/G·2409
定 价 《公共建筑》 230.00元(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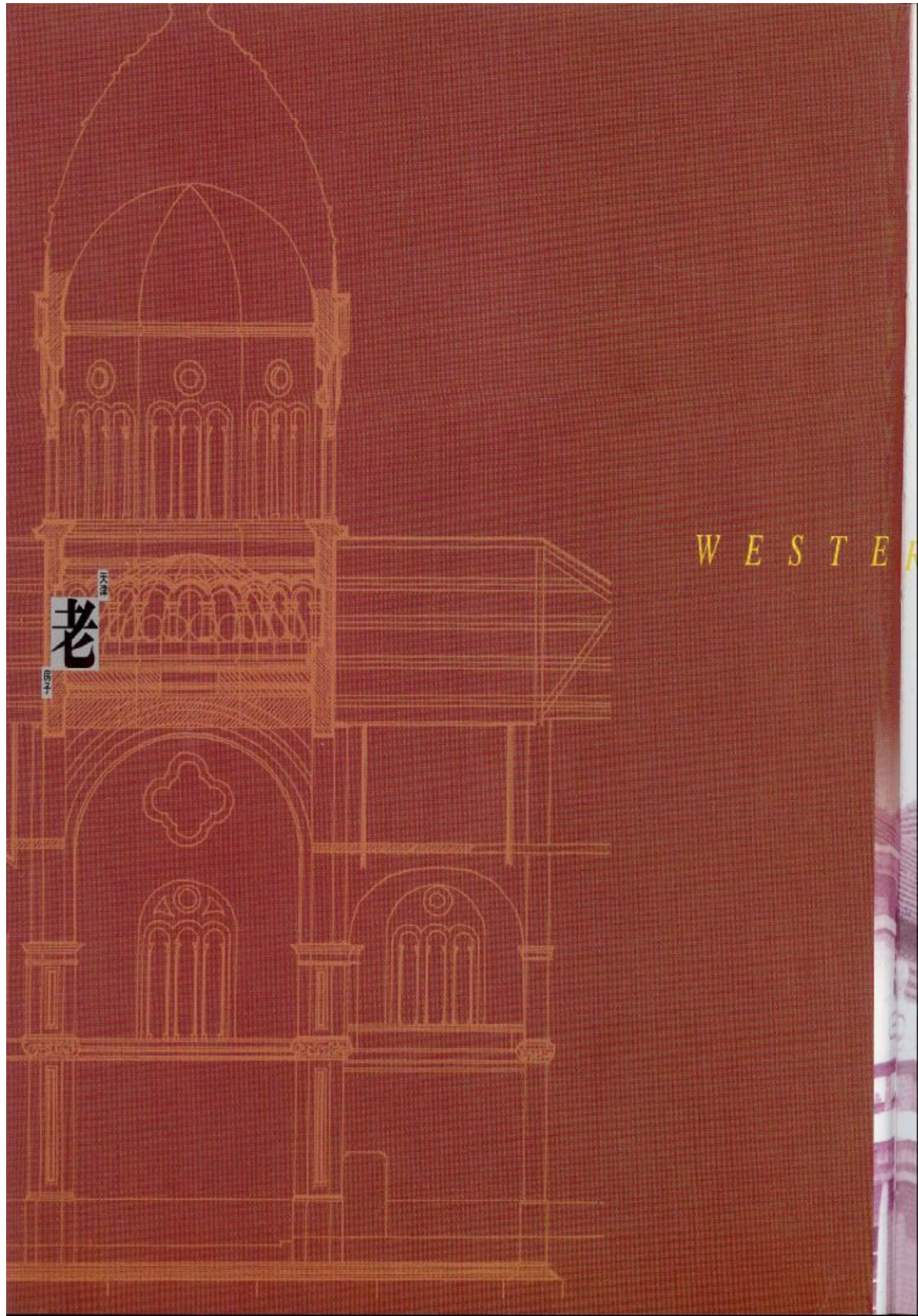


Z0500230





打开这部图集，
你便进入了闻名于世的天津“万国建筑博览会”



WESTERN

天津

老

第

顾问 王德惠 刘文燕 钱其徽 毛昌五 胡晓忱 方 放 赵友华

主 编 冯骥才

副主编 杨清文 冯亮一

常务编委 张 仲 荆其敏 林开明 杨大辛 张绍祖 夏 放 崔 锦 陈寰龙 李瑞雨

编 委 王全来 陈礼章 贾长华 孙福海 罗澍伟 张明奎 庞芙蓉 马连勇 黄殿祺

张汝科 姚建铨 穆学明 刘福凯 崔世昌

编辑单位 天津市大树画馆

天津泰丰工业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教育出版社

协助单位 天津城市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

天津市海外联谊会

天津市艺术摄影学会

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天津市摄影家协会

今晚报社

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委员会

天津国际大厦有限公司

津工图片社

天津市群众艺术馆

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

天津市房地产总公司

出版单位 天津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庞芙蓉

责任校对 程诗和

装帧设计 陈幼林视觉设计工作室

摄影组织 夏 放 陈宝江

摄影作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家吉 王晓岩 王晶一 支养年 冯 力 冯伟烈 冯骥才 曲 健

刘 震 刘震中 刘嘉琪 池士潭 吕 健 吴忠军 张 凡 张泽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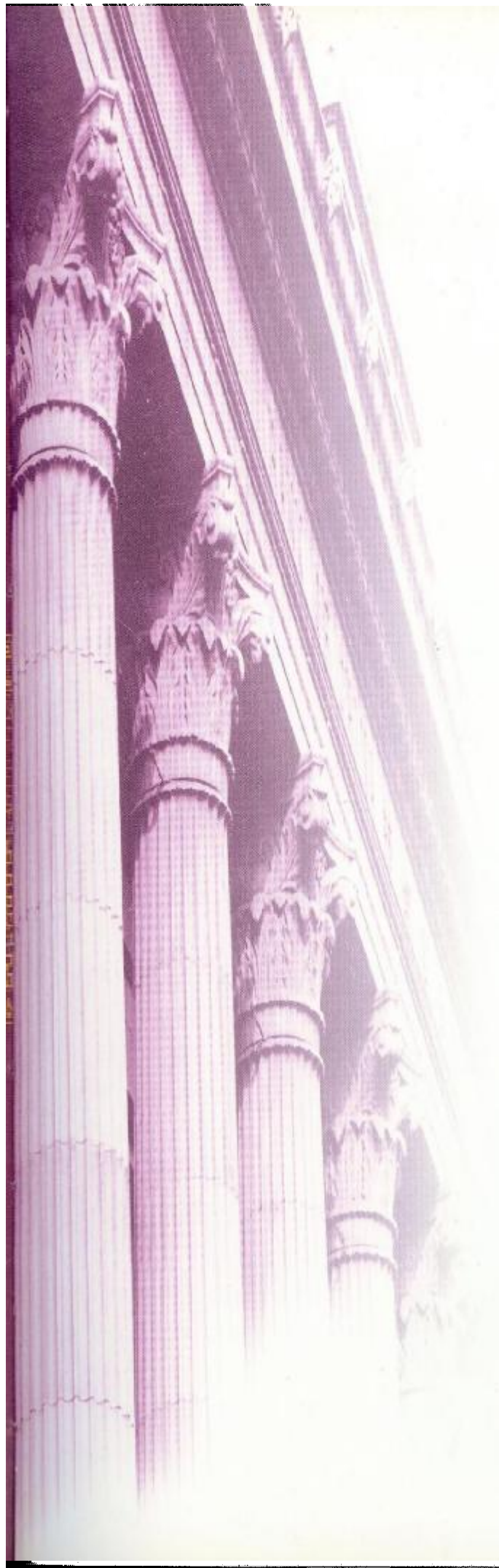
张朝玺 张佩明 李 颀 李昌元 李鉴鸿 陈宝江 赵胜文 杨惠全

郑益齐 段新培 高 平 高天明 夏 放 梁 进 崔顺才 敦 毅

常津生 曹津生 曹鑫铭 董岩青 曾志坚 焦永普 雷 平 霍文义

照片说明 冯骥才 张 仲 荆其敏 林开明 张绍祖 罗澍伟 崔世昌





论文	小洋楼的未来价值(序言)	冯骥才	001
	天津向近代城市的转化	杨大辛	004
	历史在这里汇藏	罗澍伟	008
	中外建筑文化交融的博览胜地	荆其敏	012
	洋楼人文掇拾	林开明	018
图片	I 凝固的历史		022
	(旧租界各国之领事馆、公议局、工部局、警察局、兵营及行政办公楼等)		
	II 昔日辉煌		032
	(原银行、洋行、贸易公司、写字楼等)		
	III 近代文明之光		060
	(原俱乐部、影剧院、学校、报馆、医院、公园等)		
IV 大都市的起步		084	
(早期的桥梁、电报局、邮局、电灯房、自来水公司、车站、旅店和饭店等)			
V 遥远的钟声		100	
(教堂、修女院等)			
VI 迷人的细节		112	
(门、窗、柱、墙、屋顶、楼梯、室内室外的有关细节等)			
附录	本集建筑地址一览表		208

小洋楼的未来价值 (序言)

冯骥才

天下任何名城的魅力，首先都来自它独有的建筑美。这些风情独特的建筑，是城市情感与精灵的化身，是一方水土无可替代的人文创造，是它独自历史生活的纪念碑。据此而言，津地者，小洋楼是也。

一百年来，天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人口”。一个是传统人口——从三岔口下船，举足就迈入了北方平原那种彼此大同小异的老城文化里；另一个是近代人口——由老龙头车站下车，一过万国桥，满眼外来建筑，突兀奇异，恍如异国，这便是天津最具特色、最夺目的文化风光了。

大众俗称之为小洋楼。

小洋楼不仅仅是指一座一座舶来的建筑样式，更是对这独特的城市景观的一种总称。

它与老城那边的景观遥遥相对，看上去格格不入，甚至有点势不两立。于是，此地非同寻常的历史就被这种建筑格局鲜明地勾勒出来了。如果你略通一点中国近代史，粗知几个国家曾经在这里争相占地、开辟租界的经过，特别是读过英国人马克里希写于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天津租界被围记》，就会明白这小洋楼绝非天津城市发展历史延续，其中更没有任何文脉上衍传的必然。小洋楼是一种政治强加，也是一种文化强加。它是中国近代史和东西方关系史上的一个悲剧果实。

然而，只有文化上的蠢人才会把这苦果摘掉，一扔了事；或者当做一个历史的蒙羞的私生子，弃之便罢。我们可以否定某一历史，却不能因此铲掉这历史的依据。何况作为历史的遗存，它不单是确凿的物证，还有更广泛的价值。

通常人们认为历史遗产的价值主要是历史价值，又认为历史价值只属于过去。其实历史的价值是一种被认识的价值。而对历史的认识都是为了现实与未来。那么历史价值最终是一种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



1915年天津租界地图

对于历史遗物，你从历史角度研究它，就会认识到它的历史价值；你从文化角度观察它，就会发现它的文化价值；你从审美角度端详它，还会找到它独有的审美价值。

这价值就是财富，历史留下来的财富。

小洋楼中最深厚的价值，还是它的文化价值。从它昔日的社会身份来看，它属于上层社会所拥有。由于小洋楼的地带——租界的权力独立于皇权之外，它便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

意租界工部局，位于大马路(今建国道)，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现已无存。



一个优越的、神秘的、深邃难测的空间，重大事件的后台，世外桃源与世间桃源，那些形形色色特殊人物的种种幕后活动与隐私，填满了这里的各种各样曲折而美丽的建筑里。这些在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千奇百怪的房屋，其中许多都是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棋子。不管是事件遗址，还是那些名人宅邸。然而至今我们对它们却是所知甚微。如果谁能叫这些小洋楼开口说话，说不定近代史的一些段落要重新改写。可是如果它们闭口不语，你可以走进这些楼里去用心倾听——

历史建筑所保留的是一种历史空间。由于这空间犹存，历史就变得不容置疑。徜徉其间，历史好像忽然被有血有肉地放大了。过往的生活形态仿佛随时都能被召唤回来。那些在史书中空洞的叙述，到了这里便全都神奇又丰盛地复活。你会从发现到一些独特的细节中，一下子感受到逝去已久的历史人物的某种个性。甚



戈登堂于1892年建成，李鸿章出席了剪彩仪式。它是原英租界的中心性建筑，也是第一座租界当局的市政大厅。楼前的“欧战纪念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树立的。

至连昔日的精神也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呢。历史遗物并非历史的遗骸，而作为历史的生命而存在。

事物的文化价值大多是在它成为过去时才表现出来的。事物在成为历史时不是变小，而是变大了。这因为事物的文化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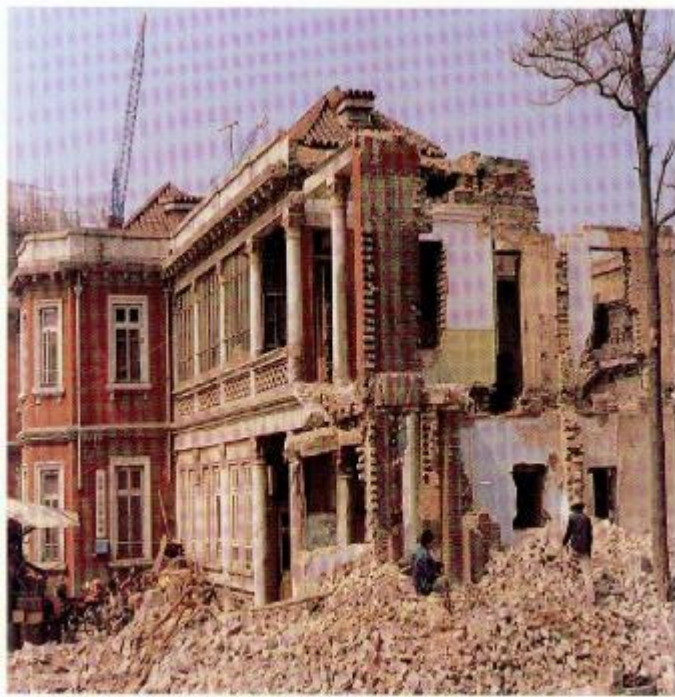
比如你仔细观察19世纪末的小洋楼，也就是西方

人在天津最早修建的那批房子——比如望海楼教堂、紫竹林教堂、大清邮局等，就会发现，其中不少建筑在风格上具有中西相杂的成分。但这决不表明天津本土对外来文化的主动迎取与接受，而是说明当时（即早期）西方人侵略力的有限。因而使得承建这些房屋的中国人，不自觉地把自己

的审美习惯表现出来。可是到了1900年前后，西方势力急剧加强，这一阶段兴建于租界的房屋，则听命于它们那些唯我独尊的洋主人，一概全是来自于各国建筑的原样照搬了。

于是，各个租界的建筑都成了不同占领国的象征。旧中街（今解放路）由于串连式地穿过几个租界，街两旁的建筑便分段呈现出法、英、德几个国家不同的面貌来。这些建筑就一下子把西方建筑史的不同国家与不同时代的风格琳琅满目地推入津门，这便是天津小洋楼又被别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由来。

然而，本世纪20年代以来，政局多变，各种身份显要或特殊的人物，从各地来到天津租界这块“超然世外”的空间里建造住宅别墅。这些延续着租界风格建造的小洋楼却不再严格遵循外来的样式规范，而是依从它们中国主人的口味与习惯，并信由中国的设计师们随心所欲地改造，致使各国租界晚期建筑彼此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一种津地所独有的小洋楼风情便悄然形成。



在大规模城市建设中，小洋楼的命运受到威胁。

它突出的代表是俗称五大道的街区。低矮的尺度宜人的楼房与花木掩映的庭院，在阴影重重中构成幽静和舒适的环境。严实而不透空的围墙增添了这些住宅的安全感与私密性。这一切显然都是那些莫测高深的房屋主人所必需。至于建筑样式的千形万状和异国情调的房屋，则是为了满足那个时代对外来文化的好奇与奢侈。于是外来文化被改造与中和，成为近代天津城市历史文化的的一个象征。

一方面是入侵者的文化强加，一方面是对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的改造。这表现了本土文化雄厚强劲的背景与巨大的融合力。从历史角度看，天津小洋楼是西方入侵的一目了然的证据；从文化角度看，它却是本土文化一个奇异的创造。进而说，是在被动历史背景下主动的文化创造。正是这一创造，使独特的历史被独特的文化记载下来。因此说，小洋楼是天津城市标志性的文化财富。

应该说，最先通透地认识这一财富价值的，是天津的老市长李瑞环先生。在他任职期间，本着“整旧如

旧”的尊重历史的精神，对天津小洋楼进行整体性修复。于是，天津这一历史文化财富，便在人们心中得到了影响深远的强调。

刻下，此地文化人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在《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图集出版之后，再次组织历史、文化、建筑、博物馆等界学者，对现存小洋楼做全面和彻底考察，同样是穿街入巷，足迹遍及城区。并将重要建筑甄选列表，然后邀集本地摄影名家四十余人，有序地展开拍摄。历经秋露春风，夏暑冬寒，前后整整一年。摄影家们为摄取一幅精美照片，伺得最佳光线，常常一连多日守候景物面前，方有所获；若不能满意，复再返工。此中辛苦，不想亦知。今秋收尾算来，总共摄取照片一万五千余帧！这足以表现此地摄影家的文化意识与责任精神。对于文化，我喜欢责任二字，肩负责任之作，要比那种诉说一己悲欢的小东西的分量重得多，也高远辽阔得多。但这次遗憾的是，图集篇幅有限，载人者不足十分之一，割爱甚巨。然而能够有如是规模，记录历史，展示文化，亦当感到高兴！文化人的幸福之一，常常是被自己的一种奉献行为而感动。

在考察与拍摄中，深感津地小洋楼的浩瀚丰富，精美非常。此地人生活其中，往往对小洋楼熟视无睹，但编者相信读者看过此图集，一定会如对他乡，单说一扇门，一根柱，一处墙饰或迷人的楼顶，就极尽华美，千姿万态，绝无雷同。小洋楼的历史不是一个悲剧的历史吗？哪来这样的创造的想象与激情？为此，学者们另有深思。小洋楼的文化，由于过去为种种偏执与浅薄之观念所囿，学术界涉及甚微。此次研究文章应是期待已久的学术收获。

津地小洋楼的历史与文化脉络纵横交错，庞杂繁冗。为了使读者读来明了，本图集编排的方式是：文章方面从历史源流做纵向阐述，图片方面从建筑类别做横向展示。故此，分作上下两集。上集为公共建筑，包

括行政、金融、工商、教育、宗教等方面；下集为住宅，即名宅与民居。所谓名宅，一是名人故居，二是要人住所，三是建筑奇品。上下两集都有大量的各类建筑细部的展现，力图显示津地小洋楼之绚丽多姿和无穷精华是也。倘若读者为此感到惊异，乃至自豪，并视小洋楼为珍宝，编者便心满意足了。

前年冬日一个聚会上，一位年轻干练的企业界人士到我面前，说他对我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主张颇为赞同，他深知我乃一介书生，编辑出版这样昂贵的图书如举千钧之鼎，便主动提出资助于我。此图集便是他实践自己诺言的结果。倘没有这位泰丰集团总裁冯兆一先生及其各界知己，尤其是副市长王德惠先生的鼎力支持，读者至今只能在报端去听我那些无力的文字呼吁而已。

然而从支持者身上，我欣喜地看到他们对小洋楼文化价值的认同。一旦文化人的深谋远虑转化为渐渐宽泛的社会呼应，清明的文明之光便由地平线升起。城

市的历史文化形成于过去，认识于现在，施惠于未来。我想，当后人流连于这历史文化空间之中，一定会称赞我们这代人文化的远见。

历史属于过去，也属于将来，小洋楼既属于历史，更属于未来。无论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乃至旅游的价值，都会在未来源源不断地显示出来，并作用深远，无可估量。历史的价值在文化中发酵，文化的价值在未来发酵。一旦发酵，则是必成意蕴无穷之好酒也。于是，这里要再次提及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每一代人都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把前人的创造留给后人。

丁丑年深秋日于醒夜轩

俄国花园，久已无存。



天津向近代城市的转化

杨大辛

小洋楼风情

天津向近代城市的转化

1860年(清咸丰十年)天津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这是以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而载入史册的。但是,作为一种契机,天津从此加速了向城市近代化的过渡,作为一种潮流,天津从此开始走向世界。当然,其中浸透了外来的屈辱与苦难。近代天津是在时代的激烈颠簸中走过来的。

一个城市的两种模式

天津以其河海通津的优越地理条件,自12世纪50年代金代迁都燕京(北京)之后,便逐步奠定了都城门户的地位,“舟车攸会,聚落始繁”。其后,元、明、清三代均定都北京,至18世纪清代中叶,天津已成为我国北方的交通枢纽、经济重镇与拱卫京畿的战略要地。此际,欧洲列强正向亚洲扩展其殖民主义势力,虎视眈眈地觊觎中国并瞄中天津。英国在1793年、1816年曾两次派遣使节来华,要求清政府开放天津,遭到拒绝。1854年英国通过发动鸦片战争已经敲开了中国大门。在此之后,又一次向清政府提出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咸丰皇帝断然斥责:“京师为犖毂重地,天津与畿辅毗连,该酋欲派夷人驻扎贸易,尤为狂妄。”唯我独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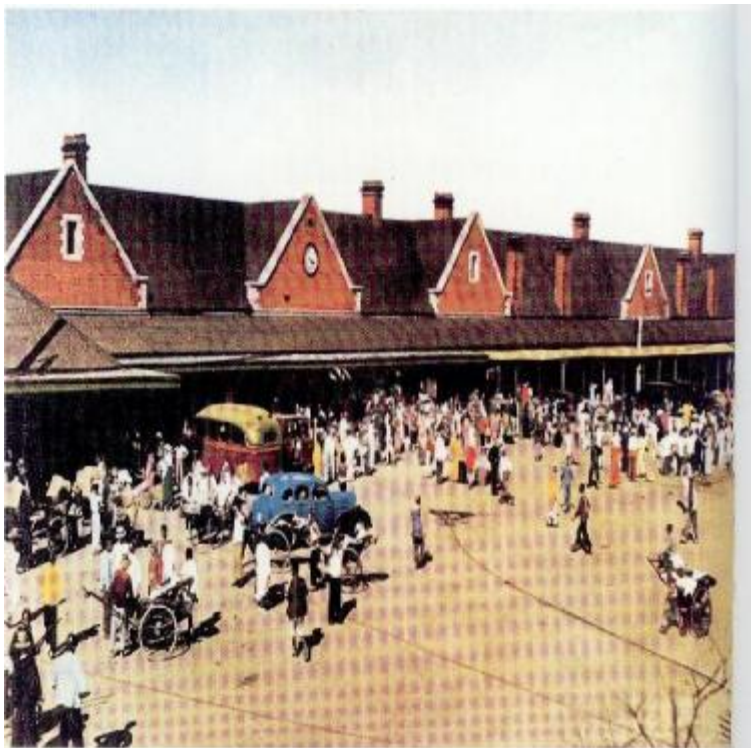
中国皇帝容不得“夷人”在自家门前做生意。

外交手段谋取不成,“尤为狂妄”的英国人更加狂妄起来,在1856年伙同法国出兵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血洗天津城,火烧圆明园,此前咸丰皇帝已仓皇逃往热河。

清政府屈辱地接受了城下之盟,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其中一款就是开天津为商埠。同年,英、法、美三国迫不及待地天津圈占土地64公顷,辟为租界,建立起威胁北京的政治桥头堡。租界选址在天津城南荒郊,海河两岸,这一带地势低洼,人烟稀少,仅临河有少许村落人家,被强行驱赶出界。

天津开埠后,尾随

军队而来的是各国商人与传教士。前者来开发贸易市场,后者来传播基督文明,洋货与圣经结伴涌入天津。他们以天津口岸为基地,逐步向华北、西北腹地延伸,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农副产品与矿产资源,雇佣廉价劳



天津东站原称老龙头车站。1888年始设于旺道庄,1892年移至现址。车站内有货车房、机车房、候车房、公事房等设施,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落成最早的车站。天津因之成为中国重要的铁路枢纽。



30年代万国桥(今解放桥)开启之景象,这也是天津作为近代先进城市的一个象征。

动力开设工厂。不远万里前来天津的“冒险家”连年有增无减。据记载,1860年最先搭乘英法军舰登陆天津的只有13名外国人,其中5名商人、3名传教士。六年后的1866年来津的外国人也不过是112人;1877年为175人;至1890年猛增到612人。此时的英法租界,已陆续出现一幢幢一片片欧洲风格的小洋楼,包括洋行、银行、饭店、教堂与住宅。更显著的变化是在海河两岸筑造了新式码头,便于外国商船的进出与停泊。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记载:1861年到达天津的轮船为111艘、26561吨;1871年为316艘、124517吨;1881年为435艘、260949吨;1891年为672艘、507464吨,是1861年艘数的6倍,吨位的19倍。这样,天津的航运中心从传统的三岔河口一带逐步转移到租界河坝码头。

天津人以奇异的目光注视着租界里出现的新事物,传统观念不能不受到冲击。一位侨居天津的钱塘文人张焘,在光绪十年(1884年)出版的《津门杂记》中有一段描写当时租界情景的文字:“英国租界,东以河为至,西以海大道为至。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路旁树木,葱郁成林。行人蚁集蜂屯,货物如山堆垒。车马轿马,彻夜不休。电线联成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滨焉。”与传统的老城区相对照,发人深思的大概就是这“制甚得法”四个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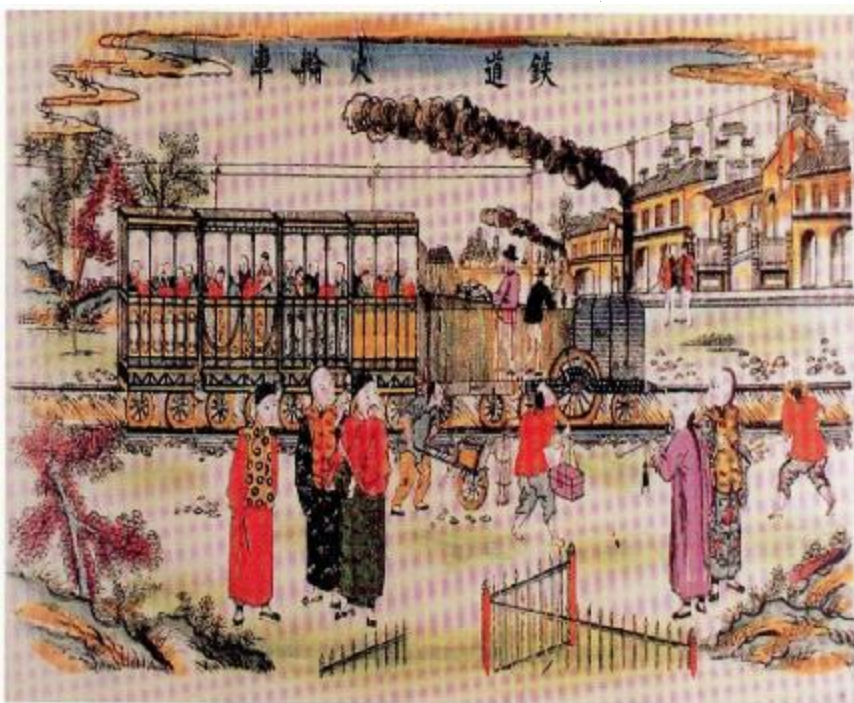
租界区的西方近代城市风貌与物质文明程度,与老

城区形成迥然不同的两种空间结构;或者说,构成一个城市的两种模式。

天津的租界不断增加,面积也逐渐扩大,至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形成英、法、美、德、日、俄、意、奥,比九国租界的局面,总面积达到1556.7公顷,相当于当时已建成的天津城区的3.47倍、旧城厢的9.8倍,

租界区面积之广远远超过老城区。来津的外国人也直线上升,1900年是2200人,到1906年增加到6341人。租界成为独立的国际性的洋人社区。租界的行政权、司法权、税收权都超越中国政府的统辖与法律之外,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害。而在另一方面,租界的管理体系、经济结构、建筑风貌、公用设施、人文意识等方面,

清末天津杨柳青年画《铁道火轮车图》



杨柳青年画中的近代天津风光



作为一种新的模式,对天津向城市近代化的过渡,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催化作用。尤其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过渡的步伐加快了。

一跃而为全国第二大城市

天津是在八国联军的屠杀中迈入20世纪的。侵略军在占领了这个城市之后,立即建立临时政权机构——都统衙门,实行全面的军事管制。1901年都统衙门强令拆除天津城。这座被视为天津象征的城堡,在当时已有五百年的历史,拆毁它是天津人从感情上所无法忍受的。有形的城垣被拆除了,无形的时代樊篱也被打破。在战争的废墟上,天津的城市建设重新起步。

1902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都统衙门手中把天津接收过来。袁世凯借鉴都统衙门对城市管理的机构设置与制度,设立了工程局、商务局、卫生局、捐务局等市政机关,并组建了我国最早的一支警察队伍,强化了城市管理体系。袁世凯在津执政期间的另一大举措是开辟了海河以北的新市区——包括一条新的干道大经路(今中山路)与两侧的街道网络,以及在大经路北端新建火车站(今北站)。在新市区的规划地段内,拆迁了大批民房与坟墓,建造商店、工厂、学校、公园与住宅,并将一些政府机关迁到河北新区,建筑格局大多仿照西方模式。为了沟通河北新区与旧城区、租界区之间的交通,跨海河修建了开启式铁桥即金钢桥。1904年经袁世凯批准,由比利时商人开办电车电灯公司,1906年建成金家窑发电厂,有轨电车同时通车,使天津成为中国最早拥有近代公共交通的城市。有轨电车先后铺设了七条路线,总长度25.3千米。

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河北新区形成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旧城厢的环城马路也逐步繁华,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日臻完善,天津的近代城市风貌初步展现出来。这一期间租界区的发展更为迅速,宏伟华丽的建筑物与

高雅别致的小洋楼住宅大批涌现。总的说来,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老城区与租界区的城市建设并肩发展,不过租界区始终领先一步。

天津的近代工业始自19世纪60年代官办的军事工业,设备与技术均从国外引进,产品基本上不进入市场,因此不能代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外资企业主要是为出口贸易服务的打包厂、打蛋厂、绒



曾经竖立在租法国公区的雕像《和平女神》(又称《圣女贞德》),现已拆毁。

毛加工厂等,规模都不大。民族资本企业也开始出现,最早的为1878年朱其昂创办的始来牟机器磨房,1884年罗三佑创办的德泰机器厂、1886年吴懋鼎创办的火柴厂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官办的军事工业被毁,天津早期的工业基础遭到全面的破坏,留下来的大批技术工匠转为民族工业发展的基本技术力量,如三条石机械工业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20世纪以后,天津的近代工业重新起步,大兴“办实业”之风,在1902年至1913年的十年间,开办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新式工厂有49家,涉及纺织、面粉、火柴、榨油、制皂、卷烟、造纸、机械制造等行业。1914年欧洲大战爆发,西方国家无暇东顾,为天津的工业发展带来契机。据1928年天津社会局的调查,当时在天津的中国城区的工厂达2186家,资本总额3300万元,其中制盐、制碱、纺织、

面粉等17家大型企业的资本额合计为2900万元,占资本总额的88%。此外,在租界内还有中外资本的工厂3000余家。20世纪20年代可称之为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腾飞时期,从而奠定了天津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

天津口岸的对外贸易在进入20世纪以后发展迅速,至30年代初达到高峰。据海关的统计:1902年的进出口贸易净值为89478464海关两,至1911年上升到116536648海关两,每年平均以300万海关两的速度递增;至1921年上升到224779202海关两,1931年更上升到350229927海关两,1921年至1931年间每年平均以1200万海关两的速度递增。若就进出口船只的艘次与吨位统计:1900年为852艘、804292吨;1911年达到2187艘、2720547吨;1931年猛增到3349艘、5000331吨,是1900年的艘次3.9倍、吨位的6.2倍。外贸的兴旺促进了港口建设与航运业发展。海河两岸大型企业的码头设施,从20世纪初期的40余处发展到150余处。早期航运业基本上为外商航运公司所垄断,自1872年中国官僚资本的轮船招商局的建立,1900年以后民营航运公司也有所发展,从而打破了航运业外商的一统天下。

天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20世纪以后出现了一股“银行热”,尤其是1928年以后进入繁盛时期。据统计:1928年天津有外资与中外合资的银行24家,华资银行(包括官办与民办)56家。由于银行大多集中在英法租界的中街(今解放路)及其周边,故中街亦有“天津华尔街”之称。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银号,发展更为活跃,1928年共有260多家。天津金融业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对华北、西北腹地的辐射面比较广,因而形成北方地区的金融中心。就金融业的总体规模而言,天津仅逊于上海而居全国第二位。

商业作为城市繁荣的窗口,天津久负盛名,传统的商业繁华区位于北大关至大胡同一线与官南官北大街,以及后来的环城马路。及至民国以后,由于壬子兵变、军阀混战、便衣队暴乱等一系列政治动乱,商业资本家深受其害,于是从20年代开始逐渐向日法租界转移,至1928年劝业场建成后,周边形成规模商业区,商业资本大批投入,旅馆、商店、饭馆、影剧院、歌舞厅栉比鳞次而立,在30年代成为天津的商业娱乐中心地带,尤其是入夜灯火通明,觥筹交错,轻歌曼舞,是有钱有闲的人们尽情享乐之乡,乃有“东方小巴黎”之称。

天津在向城市近代化转化的过程中,体现中西文化融会的城市文化结构也逐步形成。天津开埠后,扮演传播西方文化角色的传教士,他们在办学与行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显然要比传教更见实效。教会学校推行西方学制,革新了教育的知识结构,尤其是音乐、美术、

体育之类的课程,使学子耳目一新,因而天津成为开展足球、篮球、排球、滑冰、乒乓球等竞技运动最早的城市。天津近代教育事业的发达,一直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天津的新闻业起步早,发展快,是传播西方文化的重要媒体,严复在1897年创办的《国闻报》虽昙花一现,但其译著《天演论》的发表,风靡全国,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在30年代,天津出版的报纸多达三十余种,其中《大公报》、《益世报》享誉全国。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新兴文化设施,在天津出现的时间都较早。在文化娱乐方面,西方文化的渗透更为明显,西洋音乐、歌舞、绘画被视为高雅艺术享受而为知识界所接受;至于电影的传入与逐步普及,更成为广大市民群众文化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带有赌博色彩的赛马与赛回力球,也成为某些人热衷的娱乐活动。与此同时,传统的京剧、曲艺、评戏以及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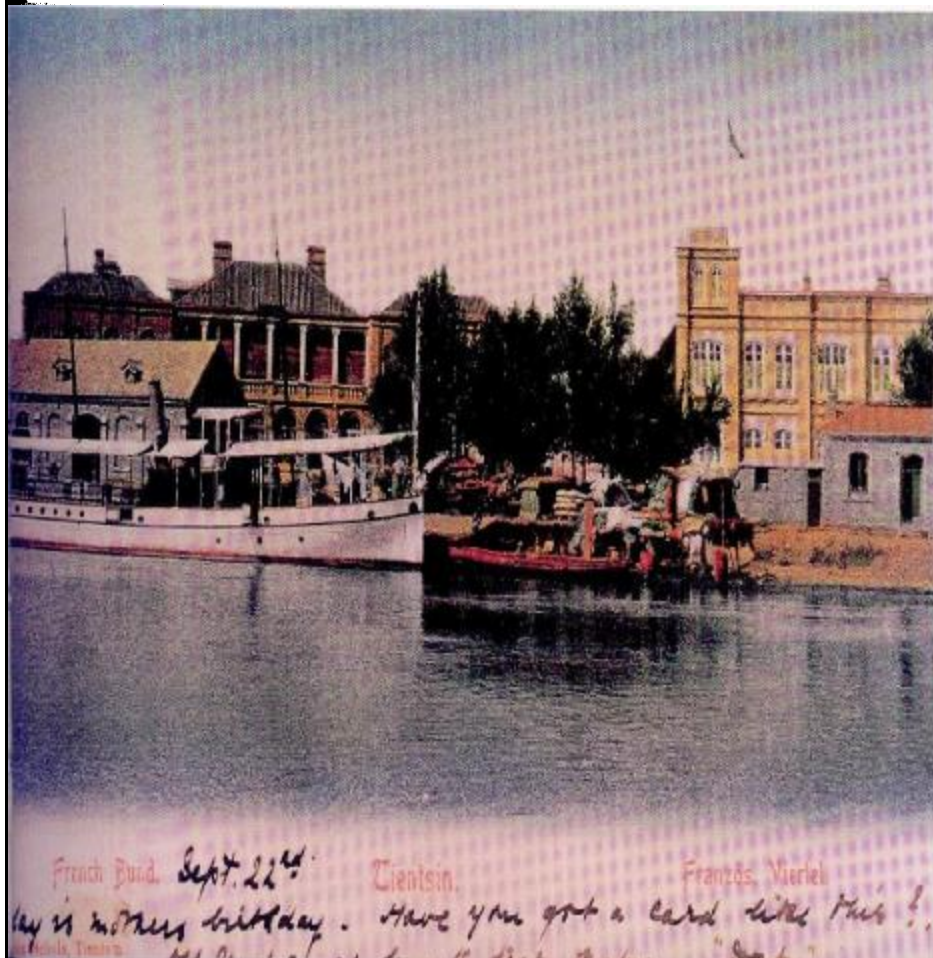
式话剧、文明戏等,都占领着很大的文化阵地。在文学活动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兴盛一时,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再现高潮,涌现了许多文学社团与文学刊物。但就文化市场的总体而言,始终不衰的则是通俗文化,包括言情、武侠小说、年画以及说唱艺术,拥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构成天津城市文化的特色。

随着城市的发展,天津的人口急剧增长。有关天津城区人口的最早统计见于《津门保甲图说》,在1840年前后为198715人;又据《天津县志》记载,1906年的城区人口为424552人,六十年间增长了一倍多。至1910年天津城区人口猛升到601432人,四年间增长了41.7%。至1925年,城区人口突破100万,1928年达到1122405人,较1910年增长86.6%。1936年由于天津周边的部分农村的划入,市区人口达到1254696人。

30年代的天津,从经济综合实力、港口吞吐能力、城市基础设施、交通网络、文化结构以及人口规模等诸多方面,在国内都居于领先地位,一跃而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

3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重新涌入天津,尤其是日本基于侵略目的的经济掠夺与兼并活动,致使民族工业的发展受阻。日本在华北走私活动的猖獗,对正常进出口贸易也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及占领天津之后,天津的经济、文化发展从而受到严重挫折。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重返天津,又因发动内战而使天津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由于这数十年的政局动荡与战乱,天津的城市发展逐步走向停滞与衰落,元气大伤。直至1949年天津解放以后,才得以复苏,再度繁荣起来。

上世纪末法租界码头。左上方柱式楼房为天津海关。建筑今已无存。



历史在这里汇藏

罗澍伟

小洋楼风情

历史在这里汇藏

记得歌德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其实，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视觉艺术，建筑又何尝不是凝固的历史呢？

当你漫步在天津街头，带着不同岁月风韵与个性的一幢幢洋楼尽收眼底；无须施展缩地短海的法术，欧陆风情似乎就来到了你的身旁。百余年来，潜移默化的时光积蓄，使这些阅尽人间沧桑的大小洋楼成了往昔天津的风信标；而洋楼中汇藏着的一幕幕历史，又代表了天津城市成长的轨迹。今天，这一幢幢洋楼成了天津的文化遗存，成了天津的标志，成了联结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如此丰富的内涵，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珍惜她、记录她、研究和保护她。

在天津，洋楼是租界的产物。提起洋楼的历史，不能不使我们想到租界，想到1860年深秋，中英签订的《续增条约》墨迹未干，便有一名叫戈登的英国工兵上尉，在天津城东南的海河西岸划定了英租界，然后设置了界石。紧接着，法、美两国也各划了一块。这样，天津便成了继上海之后，中国第二个设有租界的城市。

所谓租界，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城市里的外国侨民居



戈登堂前，消防队在进行演练。

留地。三国租界划定之初，这里多为农田或洼地。尽管英租界里的许多地块一经划出，便按“皇家租约”规定条件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买主，可是要想盖楼，必须先让承包商雇来成串的手推车，从远处运来大量泥土，把地基垫平加高，施工相当困难。最初，只有颠地洋行盖了一栋像样的楼房，后来成了英国领事馆。1864年又在海大道(大沽路)圣道堂的地皮上修建了老合众会堂。在新合众会堂建成之前，这里一直是租界侨民做礼拜的地方。此外，只是在河坝道(台儿庄路)码头附近修建了一些相当好的房屋，但租金极高。即使如此，许多洋行还是看好了英租界，他们先把土地买下，“钉上界桩，盖

一个大货栈和几间暂时居住的小房子，就心满意足了”。

租界实行的是西方式的城市自治，举凡道路建设、排水设施、路灯安装、警务人员费用，都要由租地人也就是纳税人来承担。到了19世纪70年代，英租界当局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于是便按当初戈登的规划，开始了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加高了河坝大道，修筑了当时的租界中轴线——中街(后来命名为维多利亚道)，路面笔直平坦，两旁种有双排榆树。由于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进入80年代，第一个洋商会，第一家英文报纸，第一座图书馆，第一个文学团体，第一条碎石马路，第一座公园，中国通商口岸第一座市政大厦等先后出现。与此同时，租界侨民的生活也发生了“革命”，草地网球、舞会、吸烟自由音乐会以及业余或专业剧团的戏剧演出，都可以在俱乐部里举行。法国侨民中的骑手还可以在海岸边举行撒纸赛跑。随着英租界的繁荣，楼房的需求很快“升温”，只要一盖好，马上就会租出去，住上人。甚至许多楼房在建成前很久，就有人预订了。

1887年，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一座具有西方情趣的花园——维多利亚公园在中街建成，开



1900年被洋人强行征召的天津独轮车民工

放仪式上举行了运动会和焰火晚会。公园的一角设有马术训练场。

1890年，中国通商口岸最早和最大的租界市政厅——戈登堂建成开放。整个建筑面对维多利亚公园，虽然保留着英国中古风格，但中间门楼向前突出，以便于市民接近；两端的办公室为对称的三层角楼，视野开阔，以尽量使管理者接近市民。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在应用上，都表现出了作为民政总部应有的参与性和市民性。

至此英租界规模大备，开始成为城市新的经济中心和外交中心。尤其是维多利亚路与河坝道，在80年代末，已集中了英、法、美、德、俄、日各商开设的洋行、银行、保险公司数十家。此外尚有著名的利顺德饭店、《时报》馆、梁时泰照相馆、屈臣氏大药房以及洗衣房、机器磨坊、足球场、打球场、驳船公司等等。英、比、俄、德、日、美等国的驻津领事馆，也都集中在这两条路上。

这时的英租界已经成为近代西方城市的缩影，中国传统城市从未有过的各类公用设施也先后出现。

图书馆建于80年代初，1889年移交工部局，改名英国工部局书房，藏书达7000卷。

戒酒楼，也叫禁酒楼，建在海大道圣道堂旁。为了使停泊在租界码头船上的水兵或水手不酗酒滋事，由圣道堂倡修了这座戒酒楼。来这里可以读书、阅报或做各种游戏，还经常为离港的船只举办欢送音乐会。

1886年天津印刷公司创办了租界第一家英文报纸《中国时报》，极受侨民欢迎，被誉为“远东最好的报纸”。不久这家公司又创办了天津最早的中文报纸《时报》。后来《中国时报》停刊，由英国工部局支持的《京津泰晤士报》风靡一时，天津印刷公司亦随之改组为天津印字馆。

80年代中，租界开始有了煤气，主要用于马路照明和侨民生活。与此同时，电灯亦开始用于租界堤坝工程，后来逐渐推广到洋行和各国领事馆。

1897年由一些洋行集资成立了天津自来水有限公司，1899年开始向租界供水。

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1897年由京津英侨集资修建了维多利亚医院。

租界当局为方便侨民举行各种消闲活动，建起了天津俱乐部。俱乐部里的兰心戏院是租界社会的艺术中心，1888年英国汉弥尔顿戏剧公司曾来这里演出。

租界侨民最早组织的运动俱乐部是天津赛马会，1863年开始举行赛马活动，后来在佟楼养牲园建立起固定的赛马场。

1887年租界出现了一支由受过训练的中国乐师组成的公共乐队，指挥毕格尔，公共乐队以有100个保留节目而著名，其中包括威尔第的歌剧。乐队经常在天津俱乐部、维多利亚公园、工部局动物园、妇女草地网球俱乐部演出。冬季还在溜冰场演奏，有时也为公共集会演出，或为私人舞会伴奏。水平之高得到外侨的一致赞扬。

1895年租界有了公共体育场(今新华路体育场)，地皮是由英租界纳税人捐赠的。

到了90年代，英租界已有人满之患。而毗邻的法租界，条件同等优越，能同英租界一样，为新来的外侨提供良好的商贸与居住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法租界中一排排宽敞的楼房拔地而起，道路带有照明设备，市面繁荣，人烟稠密。清王朝的许多“洋务”机构如电报学堂、津海新关、北洋医学堂等均设于法租界。特别是1883年建于法国工部局旁的海军公所(北洋水师营务处)，“衙署宏深，堂庑轩敞”，“有洋房两所，楼阁峥嵘，美轮美奂，殊耀外观，名之曰‘迎宾馆’，以备各西官过津憩息”。这可以说是西方建筑艺术影响于近代中国的典型。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租界洋楼大都是当时西方流行的砖木结构，外观多呈欧洲古典式；也有一部分是券廊式——西方建筑传入印度和东南亚一带之后，为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而在楼的四周加一圈拱券回廊，所以又叫殖民式。当时租界的范围不大，各种功能的建筑在租界中并存，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城市的功能分区。

进入20世纪，天津出现了九国租界并立的局面，1902年美租界并入英租界。仍有英、法、德、日、俄、意、奥、比六国租界存在。此后，随着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租界出现了功能性分区。大体说来，日租界的旭街、法租界的梨棧、英租界小白楼成为繁华的商业区，劝业场一带更有“小巴黎”之称。法租界的大法国路和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解放路)，成为银行林立的金融区。意租界、德租界、英国墙外推广界、法租界巴斯德路(赤峰道)、日租界官岛(鞍山道)成了著名的居住区。各类办公机构，如工部局、领事馆等，大都设在本国租界。

这一时期西方建筑风格开始发生变化，也就是从一个世纪的古典式，发展为折衷式或现代式。西方不断